

專題分析

「中」印戰略互動發展：回顧與展望

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摘 要

2005 年 4 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並針對雙方邊界爭議達成政治性指導原則，從而讓「中」印關係有了進一步發展。從中共積極拉攏印度並加強雙方關係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因應後冷戰時期全球情勢的變化，特別是經濟議題逐漸取得較政治議題更優先地位的情況下，透過邊界問題的緩解，兩國似乎浮現出擱置歷史爭議的共識，並透露出共同尋求深化現代化發展的戰略企圖。由於印度乃迄今唯一尚未與中共解決相關爭議的鄰國，這也顯示出兩國之間繼續存在的對峙態勢。作為當前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為金磚四國（BRICs）成員，人口總數合佔全球 6 分之 1，中共與印度的未來發展不僅動見觀瞻，其雙邊互動同樣引人注目。本文便希望對此進行初步分析與探討。

關鍵字：「中」印關係、權力平衡、金磚四國

壹、前言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導致雙方互動陷入長期僵局之後，直到拉吉夫（Rajiv Gandhi）在 1988 年成為 34 年來首位訪問中共的印度領袖，¹此種關係才開始解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 1989—1996 年間，「中」印關係有迅速加溫的跡象，但在 1998 年瓦巴依（Atal Behari Vajpayee）帶領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政黨聯盟執政後，一方面鼓吹「中國威脅論」，²另一方面更連續進行 5 次地下核子試驗，結果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直到 2002 年朱鎔基訪問印度，翌年瓦巴依也回訪北京並與中共簽署「中印關係原則與全面合作宣言」後才有所好轉。³其後，被稱為印度「經濟改革之父」的辛格（Manmohan Singh）於 2004 年當選新總理，中共總理溫家寶也於 2005 年 4 月訪問印度，並針對雙方邊界爭議達成政治性指導原則，從而讓「中」印關係有了進一步發展。大體來說，從中共積極拉攏印度並加強雙方關係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因應後冷戰時期全球情勢的變化，特別是經濟議題逐漸取得較政治議題更優先地位的情況下，透過邊界問題的緩解，兩國似乎浮現出擱置歷史爭議的共識，並透露出共同尋求深化現代化發展的戰略企圖。不過，同樣從邊界問題著眼，由於印度乃迄今唯一尚未與中共解決相關爭議的鄰國，這也顯示出兩國之間繼續存在的對峙態勢。無論如何，作為當前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為金磚四國（BRICs）成員，人口總數合佔全球 6 分之 1，中共與印度的未來發展不僅動見觀瞻，其雙邊互動同樣引人注目。本文便希望對此進行初步的分析與探討。

¹ 上一次訪問中共的印度領袖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他於 1954 年訪「中」，也是中共建政後首位來訪的外國元首。

²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2001), pp. 78-224.

³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4-57。

貳、「中」印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

一、潛在矛盾階段（1950—1961 年）

1949 年 10 月中共建政後，印度不僅成為繼緬甸之後，第 2 個承認新政權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同時由於談判進度超前的緣故，甚至成為第 1 個與中共建交的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⁴儘管如此，兩國之間並非全無矛盾存在，尤其是針對西藏問題，其起源則可回溯 19 世紀末葉。自從英國與清廷在 1876 年簽署解決馬嘉理事件的「煙臺條約」後，⁵便正式取得進入西藏的權利，在 1887 年發動第 1 次侵藏戰爭後，亦於 1890 年透過《「中」英藏印條約》，確立了透過通商行爲控制部分西藏事務的手段。⁶當然，英國進入西藏的動機是貿易與戰略目標兼顧的，特別是著眼於青藏高原的制高位置對印度殖民地安全，以及對英國控制東亞大陸（尤其是制衡俄國南下）所帶來的戰略效應。至於遂行此目標的高峰，則是利用 1911 年中共發生革命的契機，鼓動西藏獨立，並企圖透過 1913—1914 年西姆拉會議要求中共背書的努力。

儘管由於第 1 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英國霸權隨後衰退的緣故，英國控制西藏的企圖終究功敗垂成，但作為其前進西藏長期以來的前哨站，印度不僅在獨立後繼承了英國的基本政策原則，⁷更因獨立運動激發民族主義意識之故，致使其獨立初期的對外政策隱含著從強化獨立自主，衍生出某種擴張主義傾向的概念。至於中共在 1950 年進軍西藏的舉

⁴ 周衛平，《百年中印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62。

⁵ 根據 1874 年「中」英約定，英國從殖民地緬甸（當時屬於印度）派出隊伍勘測到雲南的交通。1875 年，英國駐華公使派書記官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攜帶入境護照，前往雲南與緬甸邊境與探險隊長柏郎（Horace Browne）上校會合，但因探險隊未先知會地方官，交涉過程發生衝突，導致馬嘉理被擊斃，此即馬嘉理事件，又稱「滇案」。

⁶ 黃鴻釗，《西藏問題的歷史淵源》（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22-31。

⁷ 前英屬印度總督寇松侯爵（Lord Curson）曾言：「…很顯然地，印度將成為亞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西面，印度可對波斯和阿富汗的命運產生支配性的影響；在北面，印度可否決在西藏的角逐；在東北面和東面，印度則能對中國施加重大壓力；它不但是暹羅獨立存在的保障，也控制著到澳大利亞和中國海的海上航道。」；參見 See Z. Hilali, "India'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sian Survey*, 41:5(2001), p. 739.

「中」印戰略互動發展：回顧與展望

動，則觸動了這條敏感神經，並埋下兩國日後爆發衝突的伏筆。可以這麼說，與中共類似的是，印度被異族不斷征服的歷史及其同化入侵者的能力「既導致了印度人的不安全感和危險感，也造就其驕傲感和自信感」，⁸使其普遍認為在世界體系中，印度理所當然應屬於上層階級。儘管如此，事實是印度若想擴張其影響，在冷戰時期沒有大國支持是極其困難的；也正因這樣，隨著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 1959 年訪問印度表態拉攏，「中」蘇共又在 1960 年分裂對壘後，印度首先在 1961 年召回駐北京大使（直到 1976 年才又重新派任），兩國更於翌年陷入戰爭對立狀態。

二、公開對立階段（1962—1987 年）

可以這麼說，正如高龍江（John Garver）所言：「地緣政治始終支配著中共與印度之間的關係」，⁹西藏問題不僅是「中」印關係核心，¹⁰其起源既來自於此區域地理特性所帶來的戰略吸引力，¹¹也由於它缺乏足夠強大的自主能量，讓它很自然地成為主要大國（19 世紀的英國與俄羅斯，20 世紀的美國與蘇聯）與鄰國（中共與印度）希望加以填補的權力真空。進言之，美國與蘇聯雖在 20 世紀中期掀起遍及全球各地的「冷戰」（Cold War），但從某個角度來看，兩強在南亞地區都選擇透過代理人（agent）來進行競爭與對抗。例如美國在 1954 年與巴基斯坦簽訂「共同防禦與援助協定」，並將其分別於 1954 與 1955 年拉進由美國主導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以及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TO）當中。¹²至於蘇聯則正如前述，自 1959 年起便頻頻與印度接觸。總體來說，或許就在中共進軍西藏、美國表態支持巴基斯坦、蘇聯透過援助進行拉攏、「中」

⁸ George K. Tanham, Kanti P. Bajpai and Amitabh Mattoo, eds., *Securing India: Strategic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Power*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96), p. 32.

⁹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p. 110-111.

¹⁰ 衛絨娥，〈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西藏大學學報》，第 23 卷 3 期，2008，頁 59-64。

¹¹ 西藏佔中共總面積 12.8%，平均高度超過 4000 公尺，有「世界屋脊」之稱。

¹² 東南亞公約組織目的是防範中共與越共向東南亞地區滲透擴張，參與者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與巴基斯坦，中部公約組織目的則在維持中東地區穩定，參與者包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與巴基斯坦。

印無法就邊界問題達成共識，以及達賴喇嘛於 1959 年出逃前往印度的多重刺激下，中共與印度終於在 1959 至 1961 年間不斷爆發邊界爭端的背景下，於 1962 年演變成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儘管印度在 1962 年戰爭中占據較主動的位置，但中共的積極應戰倒也並非全無理由。首先從內部因素看來，由於 1958 年起透過第 2 次 5 年計畫推動「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徹底失敗，不啻使中共陷入建政以來最大的政權危機中。至於在外部環境方面，蘇聯與印度關係的拉近，更讓它在「中」蘇分裂之下可能被迫面對南北夾擊的戰略威脅。¹³不過，也正因其存在內部危機，迫使中共以撤兵來表現對緩解衝突的積極態度。無論如何，戰爭還是為「中」印關係帶來負面與停滯的影響；自此，兩國雖在 1979 年與 1981 年透過外長互訪啟動了「關係正常化」進程，¹⁴並於 1981—1987 年間進行過 8 輪邊界問題談判，但直到冷戰結束之前，「中」印雙邊關係仍缺乏實質的突破性進展。

三、和解接觸階段（1988—2001 年）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述，拉吉夫不僅在 1988 年成為 34 年來首位訪問中共的印度領袖，也讓「中」印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¹⁵印度雖在政治上屬於非社會主義國家，但所謂尼赫魯式社會主義（Nehruvian Socialism）具備的「半管制性」特徵，¹⁶仍讓其面對與社會主義國家類似的低度國際競爭力與發展停滯挑戰，從而自 1970 年代中期起便顯出經濟困境跡象；¹⁷儘管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自 1980 年起便開始推動部分轉型政策，但顯然並未有效解決問題，這也是拉吉夫轉而對

¹³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9 年），頁 114-117。

¹⁴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共外交》（北京：中共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52。

¹⁵ 林良光等，《當代中共與南亞國家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89-90；Gyaneshwar Chaturvedi, *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 to Present Day* (New Delhi: M.G. Publishers, 1991), p.117.

¹⁶ 印度在獨立後廢止傳統的柴明達爾（zamindar）農奴制度，一方面自 1951 年起推動以「五年計畫」為主的計畫經濟路線，並於 1959 年推動類似人民公社的合作式農耕（cooperative farming）制度，強調以國營公有原則來提升經濟發展；參考 Barbara Metcalf & Thomas Metcalf, 《劍橋印度簡史》（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290-291。

¹⁷ 孫士海編，《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共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5-86。

「中」印戰略互動發展：回顧與展望

中共採取和解路線的重要背景之一，尤其可瞭解後者轉向改革開放 10 年來的經驗累積。相對地，透過周邊和平環境實現自身現代化目標的需求，¹⁸也讓中共願意積極配合印度的接觸政策。

無論如何，印度自 1990 年代起逐步升高的政治紛爭，仍為「中」印關係帶來一項不確定的變數來源。在人民黨的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與謝卡爾（Chandra Shekhar）於 1989 至 1991 年間取代國大黨組閣後，一方面在 1991 至 1996 年重新領導國大黨取回政權的拉奧（P.V. Narasimha Rao）同時將「中」印關係推向某種正面高峰。¹⁹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國家主席江澤民亦於 1991 與 1996 年分別訪問印度，但民主政治的競爭邏輯微妙地讓敵對的人民黨取代了國大黨的激進民族主義路線，代表該黨在 1998 年出任總理的瓦巴依更因主導在同年連續進行 5 次核試，企圖藉此「證明」印度的大國潛力，²⁰由此既激化了南亞國際格局的緊張，也使「中」印關係陡然重回對立狀態。²¹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兩國在經貿互動層面的明顯進展，²²終究使其得以「鬥而不破」地維持基本關係，並在 2001 年後逐步重建並強化彼此的互動聯繫。

四、強化互動階段（2002 年迄今）

相較於上一波起自 1988 年的「中」印和解，此階段主要由中共扮演較主動的角色，至於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 2002 年 1 月的訪問印度則是其起點。從某個角度來說，影響此際中共外交政策的關鍵在於「中」美關係的發展；自從小布希在 1999 年競選期間公開宣稱中共是美國的

¹⁸ 張蘊嶺，〈構建中共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新型關係〉，收於張蘊嶺編，《中共與周邊國家：構建新型夥伴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

¹⁹ 高鯤與王敏秋編，《南亞政治經濟發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78。

²⁰ Raj Chengappa, *Weapons of Peace: The Secret Story of India's Quest to be a Nuclear Power*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2000), p. 130.

²¹ 印度其實早在 1974 年便進行過第一次核子試驗，這也是 NPT 條約締結後首度核試。

²² 中印不僅雙邊貿易額在 2008 年達到 360 億美元的紀錄（相較於前述印俄同年貿易額僅有 70 億美元的水準），更使中共超越歐盟與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Hugo Restall, "India's Com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006, pp.12-17;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story.php?storyID=13774>.

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後，²³所謂「中國威脅論」（China's threat）不僅逐漸主導美國對「中」政策，其雙邊關係也在 2001 年的軍機擦撞事件後，一度陷入谷底。可以這麼說，隨之爆發的 911 恐怖攻擊表面上雖拉近了「中」美互動，但美國日益增強的單邊主義傾向，再加上為發動阿富汗戰爭而大力拉攏巴基斯坦等，²⁴使中共必須重估其政策內涵，尤其美巴關係的發展更無疑成為間接促進「中」印新和解發展的催化劑。正是在前述背景之下，印度總理瓦巴依緊接著在 2003 年訪問中共，與其簽署「『中』印關係原則與全面合作宣言」。²⁵其後，「中」印關係在 2005 年達到某種高峰狀態。例如溫家寶便在 2005 年回訪印度，與其簽署了「聯合聲明」，並宣布翌（2006）年為「『中』印友好年」，兩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同時簽署「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雙方甚至於同年舉行首度副外長級戰略對話，²⁶會談內容包括邊界、國際核能合作、反恐與區域安全問題等。除此之外，兩國元首亦在 2009 年「金磚四國」首屆高峰會議中決定設立總理熱線。儘管如此，中共在南亞事務大致上依舊傾向巴基斯坦，²⁷也不完全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²⁸從而突顯出雙邊互動的負面意涵及其不確定的未來性。

參、「中」印關係的潛在變數分析

一、歷史性邊界劃定爭議

²³ Lanxin Xiang, "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 43:3(2001), p. 19.

²⁴ 據估計美國在 2001-07 年間對巴基斯坦援助達到 100 億美元以上，歐巴馬總統也繼續在 2009 年簽署法案，提供巴國 75 億美元以提振其發展程度。

²⁵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頁 56-57。

²⁶ 張力，〈「中」印戰略對話：探索中印戰略互動機制及其制約〉，《南亞研究季刊》，第 3 期（2009），頁 1-7；另參考「戰略對話為中印關係指路」，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3153471.html>（2010 年 9 月 15 日瀏覽）。

²⁷ P.L. Bhola, "Sino-Pak Relations in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7:2(1994), pp. 11-27.

²⁸ 據稱中共副外長武大偉曾於 2005 年的雙邊會談中，表達「理解並支持印度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願望」的態度，但僅見於印度媒體報導，中共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隨後則表示將反對由印度、德國、日本與巴西等國所提的擴大安理會方案。

中共與印度兩國邊界全長約 1,700 公里，其中包括西段的 600 公里，中段的 450 公里與東段約 650 公里，爭議地區面積約 12.5 萬平方公里；在 2004 年「中」俄簽署東段國界協議並於 2008 年完成勘界工作後，「中」印邊界也成為中共最後一段未定國界。²⁹事實上，為回應中共在 1950 年進軍西藏所帶來的壓力，印度不僅在 1951 年出兵進駐達旺（Tawang）地區，³⁰1954 年更主動修改地圖，把 1914 年西姆拉草約中未定之「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列為已定國界。³¹大體上，印度疆域觀念主要受到源自英國殖民時期的「大印度聯邦」構想影響；根據尼赫魯提出的「理想邊界」，希望將喀什米爾、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作為印度國防內線，把西藏作為印度勢力範圍內的「緩衝國」，然後以前述麥克馬洪線區隔「中」印邊界。

在 1962 年戰爭失利後，印度雖於 1969 年表示願「進行有意義的會談」，但為長期抗衡中共，一方面在 1971 年與蘇聯簽定為期 20 年的軍事同盟條約，同時又把所佔領的「東北邊境特區」（1954 年劃歸外交部管轄），在 1972 年提升為聯邦直轄的「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甚至印度國會更於 1986 年將前述直轄區再升格為印度第 24 個邦，從而落實其「合法性」地位。³²儘管如此，為解決長期邊界爭端，兩國仍在 1981—1987 年間舉行第 1 階段 8 輪的副部長級會談，接著在 1988 年拉吉夫的「破冰之旅」後，「中」印雙方繼續在 1989—2002 年間進行第 2 階段的 14 輪磋商，先後於 1993 和 1996 年簽訂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³³最後，以前述兩項協定以及 2002

²⁹ 事實上尚未與中共完成邊界劃定的還有不丹（迄今未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但雙方至 2010 年已召開 19 輪邊界談判，更甚者，由於不丹具有印度「準屬國」性質，因此它與中共的邊界問題其實與「中」印爭議具有某種「包裹」性質。

³⁰ 王宏緯，《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係研究》（北京：中共藏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13-114。

³¹ 麥克馬洪線是由英屬印度外交秘書兼首席談判代表麥克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在 1913 年建議之「中」印邊界劃定標準，走向起自不丹與西藏交界，沿分水嶺和山脊線至雲南獨龍江東南的伊素拉希山口，將傳統上由西藏享有管轄權、稅收權和放牧權約 9 萬平方公里領土劃歸印度。

³²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頁 70。

³³ 張力，〈印度戰略崛起與「中」印關係：問題、趨勢與應對〉，《南亞研究季刊》，第

—2003 年領導人互訪達成之共識作為基礎，³⁴「中」印也在 2003 年確定所謂「三步走」戰略，亦即先確立基本指導原則，再達成落實指導原則的框架協定，最後才進行實際劃界，從而將雙方推進到第 3 階段談判中（層級也提高為部長級）。至 2009 年 8 月為止，已進行 13 輪會談，但依舊在框架協定部分僵持不下。³⁵值得一提的是，溫家寶曾提出「有讓有得」原則，亦即中共將阿克賽欽交給印度，印方則相對地將阿魯納恰爾邦交給中共，但雙方並未達成最後協議。

二、印巴關係與南亞權力平衡

事實上，中共與印度始終對彼此崛起深具戒心。對後者而言，正如所謂「英迪拉主義」（Indira Doctrine）所暗示的，印度希望以「區域大國」作為階段性外交方向，例如 1983 年提出「南亞是南亞人的南亞」之「南亞版門羅主義」說法，目的是將此區域作為其崛起之戰略依託。³⁶相對地，對中共來說，它雖無意也不可能與前者在南亞爭霸，但因印度的西藏政策直接威脅其國家安全，也迫使後者自冷戰以來，長期遂行「聯巴制印」的遏制政策。³⁷

進言之，自從 1947 年印巴分治（Partition of India）以來，雙方不僅爆發過 3 次直接戰爭衝突，³⁸在 2001 年 911 事件後，印度要求將喀什

1 期（2010），頁 3-9；鄭瑞祥編，《印度的崛起與中印關係》（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頁 341。

³⁴ 印度總理瓦巴依在 2003 年訪華時，甚至首次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共領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華活動，兩國海軍更在同年底舉行首度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³⁵ 蔡東杰，「國家利益衝突，印中邊界談判難獲共識」，《青年日報》7 版，2009 年 10 月 13 日。

³⁶ Baldev Raj Nayar and T.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9-210; see also J.N. Dixit, *Across Borders: Fifty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icus Books, 1998), p. 293; 時殷弘與宋德星，〈印度和平崛起問題及「中」美印三角關係〉，《國際展望》，第 3 期（2009），頁 12-16。

³⁷ 薛勇，〈「中」印巴三角關係與中共的南亞政策〉，《南亞研究季刊》，第 1 期，2007，頁 36-41；李昕，〈調整中的「中」印巴三角關係〉，《國際論壇》，第 9 卷 5 期，2007，頁 37-41。

³⁸ 首先是因喀什米爾主權爭議而在 1947 年爆發第 1 次印巴戰爭，儘管兩國在 1953 年發表《聯合公報》，宣布該爭議應透過公民投票解決，但仍繼續在 1965 年進行了第

米爾穆斯林組織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的作為引發巴基斯坦嚴重抗議，雙方更一度在 2002 年瀕臨戰爭邊緣。儘管如此，兩國其實自 1997 年便開始嘗試推動和平談判，只不過在 1998 年核試的影響下，直到 2004 年才終於正式啟動，2008 年底孟買爆炸案以致暫時中斷之前，總共舉行過 5 輪的「全面對話」，大致對雙邊衝突進行了廣泛的檢討。³⁹無論如何，由於印巴關係長期傾向衝突的本質，讓中共有介入的機會。可以這麼說，中共的南亞政策內涵分為 2 個階段來觀察，亦即由 1965—1998 年間以「聯巴制印」為主，轉而自 1999 年起試圖擔任區域格局的「平衡者」，至於關鍵則與中共實力上升與印巴相繼核試所帶來的威脅息息相關。⁴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南亞政策不僅因前述背景而開始變化，為解決經濟發展所需的大量能源問題，⁴¹亦促使中共和巴基斯坦在 2006 年簽署諒解備忘錄，以共同「研究建立通往中共的能源走廊」，並就重修喀拉崑崙公路（「中」巴友誼公路）達成協議。⁴²此結果不僅領先 2005 年啟動的印巴天然氣管道談判，迫使印度轉而透過加強與緬甸能源合作磋商以進行制衡，⁴³同時也讓後者國內掀起一股「中國威脅論」，⁴⁴埋下另一個

2 次戰爭。其後在 1971 年，因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而爆發的第 3 次戰爭中，印度又佔領了原先由巴國所控制地區的部分土地。最後在 1972 年簽署《西姆拉協定》（Simla Agreement），從而也將問題暫時冷卻下來；參見蔡東杰，「印巴衝突與南亞未來前景」，《青年日報》7 版，2009 年 2 月 24 日。

³⁹ 印巴和平進程由 2 部分組成，首先是 2004 年啟動的外長級「全面對話」，針對錫亞琴冰川糾紛、塞克里克灣劃界、土伯爾引水工程、恐怖主義與毒品走私、經貿合作、雙邊交流、信心建立措施，以及喀什米爾領土等 8 大問題進行討論。其次是 1983 年起便存在的「混合委員會」，由兩國外長針對既有問題進行不定期會晤；參見榮鷹，〈印巴和平進程演變及前景〉，《當代世界》，第 1 期，2010，頁 53。

⁴⁰ 例如中共在 1999 年卡吉爾衝突與 2002 年邊界衝突中的態度，便為明顯例證；參見張力，〈中共的南亞外交與喀什米爾問題〉，《南亞研究季刊》，第 1 期，2006，頁 41-47。

⁴¹ 戴永紅與秦永紅，〈中共與南亞能源合作中的地緣政治戰略考量〉，《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10，頁 77-84。

⁴² 喀拉崑崙公路（KKH）始建於 1965—78 年，全長 1,224 公里，包括中共境內的 415 公里與巴基斯坦境內 809 公里，目前僅存 809 公里，海拔落差在 600—4700 公尺之間。根據巴方在 2006 年所提出的計畫，共計將擴建 589 公里，包括曼塞赫拉至薩金段（254 公里）與萊伊考特至紅其拉甫段（335 公里）兩處，中共承諾援建路段自邊界紅其拉甫山口至塔科特大橋，全長 613 公里。

⁴³ 印度在 2006-08 年間投資緬甸超過 2 億美元，多數針對能源領域；參見馬燕冰，〈印緬關係的發展及對中共的影響〉，《亞非縱橫》，第 6 期，2009，頁 12-17。相對地，中共也在 2009 年積極提升與緬甸的能源合作關係。

面向的衝突變數。

三、雙邊磨擦與全球貿易競爭

儘管「中」印雙邊貿易額在 1992 年只有 3 億美元的規模，自 2000 年以來（當年為 29 億美元），每年都以 30% 的速度快速成長，不僅在 2006 年便突破 200 億美元（原先估計在 2008 年），2010 年更可能超越 600 億美元關卡，充分顯示出兩國經貿互動的熱度。不過，隨著印度對「中」貿易自 2006 年轉為赤字（2009 年度達到 200 億美元），該國政府在 2006 年底制定的新海外直接投資政策，亦首次把中共視為對其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由此可見雙方關係的高度不穩定性。⁴⁵例如在印度政府於 2008 年 7 至 12 月間所展開的 42 項反傾銷調查中，占了 17 個項目的中共顯然是其主要目標，涉案總金額高達 16.7 億美元，比 2007 年增長 20 倍。不僅如此，根據中共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印度對中共產品共發起 23 件貿易調查動作，已超越美國成為對中共展開相關調查最多的國家，接著在 2010 年初又相繼對原產中共的玻璃纖維和無縫鋼管發起反傾銷調查，⁴⁶這些都引發中共方面的嚴重抗議。

四、印度洋海權潛在爭霸

印度所擁有的 6,500 公里海岸線雖遠短於中共的 3 萬 2 千公里，但其突出於印度洋中部，且周邊缺乏強大鄰國的地緣特性，不僅使海權擴張（尤其著重於控制整個印度洋）長期成為其基本國策，⁴⁷特別是在 1971

⁴⁴ 中共修建青藏鐵路也被印度部分學者認為是中共軍隊在西藏地區，甚至對邊界爭議地區的軍事機動能力和後勤補給能力得到極大提高，由此對印度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見「青藏鐵路為何令印度不安？」，BBC 中文網，2010 年 9 月 2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09/10/091023_iv_china_india_railway.shtml。

⁴⁵ J. Mohan Malik,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in Kevin J. Coone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 189.

⁴⁶ 參見「貿易摩擦或成中印貿易瓶頸」，新浪財經網，2010 年 9 月 20 日，<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0211/07337406702.shtml>。

⁴⁷ S.N. Kolhi, *Sea Power and the Indian Ocean* (New Delhi: Tata McGraw-Hill, 1978); Sureesh Mehta, *Freedom to Us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 Ministry of Defense, 2007); Marcus B. Zinger,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Naval Strategy since 1971,"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2:3(1993), p. 339; Donald L. Berlin,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年第3次印巴戰爭後，印度一方面開始將海軍的廣泛利益從沿海（或近岸）逐漸延伸至深水區域，從而亦啟動了大規模的現代化努力；⁴⁸甚至該國國防部長費南德斯（George Fenandes）還在2000年公開宣稱：「印度的利益範圍將從阿拉伯海北面延伸至南海」，⁴⁹而建立一支強大的「藍水海軍」，亦被視為其「大國」形象不可或缺的軍事支柱。⁵⁰進一步來說，為遂行前述戰略設計目標，印度首先自1990年代以來，積極推動所謂「東進政策」（Look East Policy），希望拉近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關係，⁵¹同時將其海軍影響力逐步伸入南海，⁵²至於在2007年與越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則是其重要進展之一。

印度對南海興趣上升的同時，中共對印度洋地區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可以這麼說，不僅全球將近半數的海運商務經過印度洋，其中又有20%左右與石油及天然氣有關，⁵³這對期盼維持發展的中共而言，自然極其重要；只不過，中共方面雖主要關注於經濟安全領域，⁵⁴對長期將印度洋視為「天然勢力範圍」的印度來說，由此延伸出某種戰略威脅感也是很自然的。⁵⁵無論如何，為保障中共自身重大利益，它一方面努力

College Review, 59:2(2006), p. 60; Harsh V. Pant,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Growing Mismatch Between Ambitions and Capabilities," *Pacific Affairs*, 82:2(2009), pp. 279-297.

⁴⁸ K.R. 辛格，《南亞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2005年），頁82-83。

⁴⁹ 張威，〈印度海洋戰略析論〉，《當代社科視野》，第11期，2009，頁41。

⁵⁰ David Scott, "India's Drive for a Blue Water Navy,"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10:2(2007-08), pp. 38-40; see also "Naval Doctrine: An Analysis," New Delhi, 04 July 2004, <http://www.india defence.com/navaldoct.htm>.

⁵¹ 蔡東杰，〈印度東進政策下東南亞角色分析〉，《臺灣東南亞學刊》，第4卷2期，2007，頁3-26。

⁵² Tridib Chakraborti, "India's Southeast Asia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Y. Yagama Reddy ed., *Emerging India in Asia-Pacific*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 2007), pp. 160-161.

⁵³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88:2(2009), pp. 19-20.

⁵⁴ 進口石油約占中共石油總量的50%，其中，穿越印度洋進口者又占30%，至於通過印度洋進行的貿易也占中共貿易總量40%；中共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海上通道安全課題組，《海上通道安全與國際合作》（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331。

⁵⁵ 劉新華，〈論「中」印關係中的印度洋問題〉，《太平洋學報》，第18卷1期，2010，頁45-58；張貴洪，〈地區視角下的「中」印關係〉，收於張蘊嶺編，《中共與周邊國家：構建新型夥伴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62-263。

提升海軍能量，⁵⁶強化與印度洋周邊國家能源合作關係，例如投資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設，⁵⁷同時利用索馬利亞海盜威脅，自 2008 年底起不斷派遣護航艦隊穿越印度洋前往亞丁灣。就結果而言，這些作為固然提升了中共的能源安全係數，但也讓所謂「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 戰略的討論甚囂塵上，⁵⁸從而深化了印度對中共存在海洋戰略威脅的認知，⁵⁹以及兩國在印度洋進行海權競爭的趨勢。

中共在 2011 年獲國際海床管理委員會批准，於西南印度洋海底探勘礦物。這項新發展使中共堂而皇之插足印度洋，對印度猶如當頭棒喝。新德里更擔心北京藉此在區域內部署軍艦。中共大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會提出的多金屬硫化物礦區申請，已獲國際海床管理委員會批准，使大洋礦產在西南印度洋國際海底區域獲 1 萬平方公里具專屬探勘權的多金屬硫化物資源礦區，未來並享優先開採權。對此，印度海軍情報局 (Directorate of Naval Intelligence, DNI) 警告，上述發展向印度傳達的關鍵意涵在於，中共可能找到在區域內持續存在的理由，也使中共蒐集海洋與水文數據具有正當性，「尤有甚者，北京當局也找到在印度洋部署軍艦的好藉口」。中方聲稱只是試圖滿足日增的礦物需求，動機單純。不過印度海軍情報局認為，「此舉的軍事意涵相當明顯，印度海軍必須予以監控」。《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報導，中共過去曾透過緬甸與斯里蘭卡等盟友，試圖染指印度洋未果；現在則藉礦物探勘機會，首度成功插足。擔心北京當局對本區域懷抱軍事企圖的新德里當局，勢必嚴密監控。印度向來視印度洋為自家「後院」，意想不到這次竟自棄地主優勢。報導指出，至少過去 6 年，印度海軍戰略專家屢屢建

⁵⁶ Thomas Kane, *Chinese Grand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London: Frank Cass, 2002), p. 139.

⁵⁷ See Lee Jae-Hyung, "China's Expanding Maritime Ambi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4:3(2002), p. 556; Tarique Niazi, "Gwadar: China's Naval Outpost in the Indian Ocean," *China Brief*, February 28, 2005, <http://www.jamestown.org/news.details.php.news.id=93>.

⁵⁸ Gurpreet S. Khurana,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Security Implic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32:1(2008), http://www.idsa.in/strategicanalysis/ChinasStringofPearlsintheIndianOceanandItsSecurityImplications_gskhurana_0108.

⁵⁹ Sukanta Acharya, "Security Dilemmas in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44:1(2007), pp. 57-72; 張貴洪，〈印度對中共崛起的看法和反應〉，《南亞研究》，第 1 期，2005，頁 27-32。

「中」印戰略互動發展：回顧與展望

議政府要先發制人，善用印度洋採礦權，這下卻被中共掌握先機，這項新發展對政府當局衝擊頗大。中共大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會所申請的礦區位於西南印度洋中脊，限定在長度 990 公里、寬度 290 公里的長方形範圍內。協會將於年內與國際海床管理委員簽訂為期 15 年的探勘合約。這是大洋礦產繼 2001 年在東太平洋獲得 7.5 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結合資源探勘區後，在國際海底所獲第 2 塊享有專屬探勘權和優先開採權的海底礦區。⁶⁰

肆、「中」印互動之合作面向探討

一、能源議題合作

儘管部份學者認為「中」印雙邊關係依舊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⁶¹但「中」印關係從印度總理瓦巴依在 2003 年訪「中」時所界定的「長期建設性夥伴關係」，升格到 2005 年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印時所宣稱的「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⁶²仍反映出兩國自 1990 年代以來，彼此需求不斷上升的持續趨勢。尤其在能源議題方面，不僅印度身為當前全球第 6 大消費國，在 1991 至 2001 年間石油消費增長了 83.5%，估計 2025 年每日消耗量將達到 530 萬桶左右，⁶³中共更身為全球第 2 大消費國家，在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後，估計 2020 年的每日消耗量將超過 800 萬桶；更甚者，由於兩國能源大多數（70%以上）均有賴進口，非但穩定進口來源成為重要政策方向，在「能源危機」來臨的背景，雙方也一度在 2000—2004 年間陷入激烈的競爭態勢當中。⁶⁴

⁶⁰ 參見〈「中」獲印度洋採礦權，印衝擊大〉，中時電子報，2011 年 8 月 3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4/132011080300654.html>

⁶¹ Stephen P. Cohen,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 in South Asia: Unknowable Future," in Ramesh Thakur and Oddny Wiggen, eds., *South Asia in the Worl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4.

⁶² 趙干城，〈「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特性與發展前景〉，《南亞研究季刊》，第 1 期，2010，頁 20。

⁶³ 中共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頁 251。

⁶⁴ 參見〈競爭海外油田，中印能源爭奪戰緣何愈演愈烈〉，百靈財經網，2010/9/21，<http://health.beelink.com.cn/20041214/1745274.shtml>。

無論如何，在「亞洲石油溢價」(Asian Premium)的嚴峻現實下，⁶⁵印度首先在 2005 年召開「亞洲石油供應國與消費國部長級圓桌會議」，並在同年舉辦的亞洲天然氣採購會上，公開倡議建立一個「亞洲天然氣網絡」機制，從而開啓了跨國能源合作的新起點。⁶⁶接著，「中」印在 2005 年首先聯手收購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幼發拉底公司 38% 的股份，在兩國政府於 2006 年簽署能源合作備忘錄後，同年又聯手購得哥倫比亞一家石油公司 50% 的股權。隨後在 2007 年，印度國營天然氣公司與中國大陸天然氣公司宣布共同成立一家合資公司，⁶⁷由此可見雙方在共同利益的理性驅使下，進行長期合作的可能軌跡。

二、氣候與水資源議題合作

可以這麼說，相較於中共與印度在傳統安全領域中依舊維持競爭氣氛，兩國在非傳統安全方面倒透露出若干正面互動的機會，除了前述能源議題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乃是氣候議題。首先，兩國同屬人口最多且發展迅速的第三世界經濟體，導致其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均大幅增加。為維繫經濟永續發展，並應對當前國際氣候談判的壓力，雙方在 2009 年底舉行「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聯合研討會」，同時簽署了「關於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協定」，據此，兩國將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夥伴關係，建立雙邊氣候變化工作小組，就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重大問題交換政策看法。⁶⁸

除了氣候議題外，「中」印兩國在水資源議題方面的互動也值得關注。眾所周知，水資源不僅繼石油後成為眾所矚目的能源焦點，自古以來，為爭奪相關資源所引發的國際衝突亦屢見不鮮。根據美國國家情報

⁶⁵ 所謂石油溢價是指中東國家賣給亞洲國家的石油價格，每桶比歐美國家高出 1—2 美元，致使亞洲消費國家每年至少多支付 50—100 億美元的結果。

⁶⁶ 李渤與周迪，〈試析「中」印能源合作的動態競合關係〉，《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 5 期（2010），頁 166；「共同利益使『中』日韓印攜手新德里：以石油的名義」，國際在線，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7212/2005/01/10/521@418356.htm>。

⁶⁷ 劉文，〈中共與印度能源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東南亞縱橫》，第 12 期，2008，頁 68。

⁶⁸ 鄧剛，〈氣候合作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分析〉，《技術與市場》，第 16 卷 12 期，2009，頁 38-39。

委員會在 2008 年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2025 年估計將有 36 個國家的 14 億人口面對缺水威脅。⁶⁹至於一份 2009 年亞洲協會的研究報告，更指出水資源將是新世紀亞洲地區主要的衝突根源之一。⁷⁰儘管中共是否將藉由啓動青藏高原的跨流域調水工程，控制恆河上游並間接對印度帶來威脅，一度成爲後者「中國威脅論」的部分立論基礎，⁷¹兩國仍以 2002 年「關於中方向印方提供雅魯藏布江－布拉特普特河汛期水文資料實施方案」爲起點，在 2005 年溫家寶訪印期間達成水資源合作協議，簽署「中方向印方提供朗欽藏布江－薩特累季河汛期水文資料諒解備忘錄」，希望以資訊分享爲基礎，以推動長期合作。⁷²當然，雙方對此點並非全無矛盾存在，例如印度希望在雅魯藏布江建立「上西昂河水電站」的計畫便曾在 2009 年引發兩國輿論激烈交鋒，但大體上仍未能影響以合作爲主的發展趨勢。

三、不確定的大國權力平衡議題

最後，從全球大國戰略格局看來，中共與印度其實同時處於 2 個戰略三角結構，亦即「『中』美印三角」與「『中』俄印三角」的重疊處。就前者而言，隨著美國小布希政府在 2001 年將中共視爲「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並公布「全國飛彈防禦計畫」（NMD），「聯印制『中』」不僅成爲美國對「中」戰略一環，正如美國前外交官卡克（Dennis Kux）所言：「如果『中』美關係遇到瓶頸，則美印關係自然將對美國產生更多的實用價值」，⁷³一方面印度主動在 2002 年美國國防部綜合評估辦公室和印度綜合防務參謀部舉行的研討會中，主張建立以美國爲首的亞太安全體系（或稱爲亞洲版北約組織），即「北美－亞洲條約組織」

⁶⁹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3/Global-Trends-2025.pdf.

⁷⁰ Asia Society, "Asia Society: Asia's Next Challenge: Securing the Region's Water Future,"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9311/asia_society.html

⁷¹ Vijai K. Nair, "The Chinese Threat: An Indian Perspective," *China Brief*, 1:9(2001),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tt_news\]=28480&tx_ttnews\[backPid\]=191&no_cache=1](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tt_news]=28480&tx_ttnews[backPid]=191&no_cache=1)

⁷² 藍建學，〈水資源安全合作與中印關係互動〉，《國際問題研究》，第 6 期，2009，頁 40-41。

⁷³ Dennis Kux, "India's Fin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81:3(2002), p. 95.

(NAATO)，⁷⁴在美印於 2004 年確定建立「全球戰略夥伴關係」後，布希又在 2006 年訪問印度時與其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企圖透過對於印度核子地位的背書來加以拉攏。歐巴馬總統也在 2009 年印度總理辛格訪美期間，強調印度是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而美印關係也是美國在新世紀中「決定性的關係」之一。

儘管如此，美國如此積極的作為依舊並未全然確定美印同盟的地位。⁷⁵非但「中」印關係正如前述，存在「鬥而不破」且「和戰並存」狀態，「中」俄兩國拉攏印度反制美國的意圖既相當明顯，「Chindia」名詞的出現對「中」印關係更具有重要之象徵意義。⁷⁶值得注意的是，美印關係升溫的同時，根據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在 1998 年底的倡議，「中」俄印三國也從 2001 年的 3 方 2 軌對話出發，繼 2005 年 3 國外長在俄羅斯舉行「非正式會晤」後，3 國元首更於 2006 年進行了歷史性高峰會。⁷⁷由於 3 國合計總人口數達到 25 億，占全世界人口 40% 以上，GDP 總量也合占全球 20% 左右，總體影響力不容小覷，甚至一般認為還有機會與歐盟及美國鼎足而三。根據 2009 年第 9 次 3 國外長會議所發表《聯合公報》顯示，目前其共識主要有 2，首先是希望提升 G20，以逐漸取代 G8 的地位，其次是試圖以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協調行動的平臺。⁷⁸當然，未來「中」俄印三角發展絕非毫無阻礙，除前述「中」美印三角的牽制之外，無論是「中」印互動、印巴關係或另一組「美日印三角」框架的進展，都可能

⁷⁴ Anirudh Suri, "India and Japan: Congruence, at last," *Asia Times Online*, June 9,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IF09Df03.html.

⁷⁵ 程瑞聲，〈關於「中」印美三邊關係的一些思考〉，《南亞研究季刊》，第 3 期，2008，頁 2；張貴洪，〈「中」印關係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南亞研究季刊》，第 1 期，2010，頁 41。

⁷⁶ See Jairam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ng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Pete Engardio, ed., *Chindia: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volutionizing Global Busi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7).

⁷⁷ 馬加力，〈「中」俄印三角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收於張蘊嶺與藍建學主編，《面向未來的中俄印合作》（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127；崔繼新，〈「中」俄印三邊合作的穩定發展及其制約因素〉，《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4 期，2009，頁 64-70。

⁷⁸ 宋德星，「『中』俄印外長會晤評述」，新華網，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30/content_12361001.htm。

「中」印戰略互動發展：回顧與展望

對其帶來不確定的變數來源。

伍、結論

在中共與印度於 2010 年建交 60 周年之際，兩國關係發展依舊呈現前途未卜的格局，不僅長期懸而未決的邊界爭議是雙邊互動的關鍵阻礙，⁷⁹事實上，印度對中共的戒心始終沒有降低。例如 1998 年核試表面上雖針對巴基斯坦而來，但中共經濟崛起及其對南亞地區所展現的強大吸引力，也是印度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⁸⁰至於雙方在邊界地區的活動，更經常成為兩國國內與國際媒體炒作對象。例如印度據稱在 2010 年 8 月決定啟動增強邊境安全的新措施，向阿魯納恰爾邦增派 2 個師的部隊，估計兵力超過 2 萬人，自然而然便成為媒體關注焦點所在。

可以這麼說，由於冷戰結束後蘇聯崩解，加上美國注意力聚焦中東，暫時的大國權力真空狀態也讓「中」印關係在 1988—2001 年間進入所謂的「和解接觸階段」，並在殘留的歷史衝突記憶下，展開全面的合作嘗試。⁸¹無論如何，由於中共經濟迅速崛起帶來某種刺激競爭的壓力，而隨後印度崛起也引發大國再度關注，包括美國、俄羅斯與日本都努力強化與其互動關係，加拿大與英國亦於 2010 年分別提升與印度交流熱度，這些都讓「中」印關係在持續提升之餘，同時面對不斷變遷的戰略環境挑戰。整體言之，在目前國際體系維持「經濟發展至上」的背景，在可見的未來，中共與印度的雙邊關係應該繼續維持基本穩定狀態，至於美國介入政策與邊界問題可能的擦槍走火，是主要負面變數。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⁷⁹ 馬加力，〈印度大國外交的新態勢〉，《和平與發展》，第 1 期，2008 年，頁 57。

⁸⁰ Neil Jock, "Nuclear Developments in India and Pakistan," *Access Asia Review*, 2:2(1999), p. 20.

⁸¹ 趙干城，〈印度：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81-189。